

現代性、市場經濟與社會改革

劉孟奇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本文原載於 2006/05 當代雜誌)

導論：現代性與市場經濟

在維基百科的英文版當中，對於什麼是「現代性」(modernity)的特質，洋洋灑灑列舉了二、三十項(註一)。不過，儘管現代性被認為有眾多與「前現代社會」有所不同的特質，這些特質主要還是根源於在歷史上具有特殊性的社會結構。以 Fotopoulos (2005) 的話來說，也就是：讓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產生區別的，主要在於兩種制度，第一是市場經濟體系，第二是代議民主。

經濟史學者 Heilbroner 與 Milberg (2001) 認為，面對資源稀少性的限制，所有的社會都必須解決兩個重要的經濟問題，其一是如何進行生產、如何有效動員社會能量生產所需事物；另一是如何分配、如何對於「誰獲得什麼」提供一個基本上可為社會接受的解答。而在歷史上，人們主要發展出三種體系來解決這兩個問題，第一是依靠傳統，第二是聽從指令，第三則是市場體系。這三者並存於不同歷史階段之中，而在我們已知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主宰社會經濟的主要是依靠傳統或由指令運作的體系，市場經濟只扮演附屬與補充的角色。但是近三、四百年來，隨著歐洲封建體系沒落瓦解，民族國家與商業資本主義興起，市場體系逐漸成為歐洲社會解決經濟問題的最主要方式，而市場社會的主導地位，更從歐洲逐步擴散到全球，也成為種種現代性的制度性根源。

雖然在一百多年來，許多傳統社會—包括台灣—都經歷了熱忱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但是近十幾年來，「現代性」卻受到越來越多的批判與挑戰。舉例而言，有許多知識份子呼應 Beck 和 Giddens 所提出的「反省的現代性」或「反省性的現代化」觀念，認為必須反省「簡單現代化」帶來的問題，要求「超越過往的功

利角度，重新開發人類的反省能力，以追求一個更符合生態、平等、互相尊重與安全的社會」（顧忠華，2006：88）隨著「現代性」受到質疑，產生現代性的社會制度，特別是市場經濟，也成為不少社會改革論述的批判對象。例如 Fotopoulos (2005) 就認為市場經濟造成了經濟面向、政治面向、社會面向、文化面向、生態面向、以及意識型態面向的「多面向危機」。在這種氛圍下，「市場化」或「商品化」被許多社會運動者認為與「進步性」背道而馳，更不應當出現在社會改革的議程當中。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將試著從現代性的觀念出發，探討市場與社會改革的關係。特別是「經濟自由主義」普遍被視為是支持「市場現代性」的主要意識型態，而主流經濟學家則被視為是經濟自由主義的代言人，但是在不少對於所謂「經濟自由主義」的批判性介紹中，往往隱含著對於「經濟學怎麼說」相當程度的誤解。特別是：經濟學是否在鼓吹一種「沒有反省的現代性」或支持一種「缺乏反省性的現代化」？筆者希望首先釐清經濟學對於一些「現代性」相關觀念的立場，再由此出發，探討市場現代性的內容與意涵。

市場機制、分工、成長與風險

現代市場社會的特點就是絕大部分的生產與分配過程不再為宗教、社會、政治上的習慣或指令所約束控制，而是由市場供需、價格、利潤所引導。要達到這樣的市場現代性，前市場社會或非市場社會通常必須經歷劇烈變化，例如：在重視習慣與傳統的社會中，追求利潤通常會受到壓抑，但是在市場社會中，利潤動機不但必須被正當化，更必須成為社會生活與社會關係的主要驅動力；絕大部分的事物與工作都必須能夠被標上貨幣價格，成為商品，進入買賣過程，而由買賣來控制絕大部分產品的產出與工作的表現；市場供給與需求必須取代風俗習慣與政治裁量，成為經濟活動的引導力量。(Heilbroner 與 Milberg, 2002：31-33)

簡而言之，營利動機、商品化與市場化是市場現代性的重要特質。不過在此同時，這些也是經常引起批判的對象。先不論這些批判是否公允，從歷史角度來

看，市場現代性的達成，的確很少是「自然出現」的結果，而經常與國家的強力介入有關。即使在市場社會的濫觴—西歐—也是如此，更不用說在許多傳統社會，幾乎都是先由國家力量強行打破原先的社會狀態，再展開大規模的商品化與市場化過程。而這些社會接受市場現代性，往往伴隨著動盪不安的歷史過程與愛恨交織的複雜情緒。為何如此？傳統社會抗拒市場現代性，是否純粹只是出於因循與不理性的反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考慮市場現代性的另兩個重要特質，就是高度的專業化分工、以及快速與持續的創新（註二）。這兩者成就了市場社會驚人的生產力，不只帶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也造就帝國主義的船堅砲利，進而「威逼利誘」絕大部分的傳統社會向市場社會靠攏轉型。問題是，如果沒有奠基於市場競爭的「自律市場」（self-regulated market），或者說所謂的「競爭市場機制」存在的話，試圖進行高度專業分工與積極創新，對於一個社會而言，不只難以達成，更可能帶來無法承擔的風險。

首先，就分工而言，高度分工讓人們可以享受專業化與規模經濟帶來的巨大好處，但是另一方面，高度分工也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依賴許許多多的陌生人提供絕大部分的生活所需，而這使得社會面對幾個重大的挑戰：我們怎麼確定個人能夠瞭解並且提供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同時數量不會太多或太少？我們怎麼讓越來越複雜的生產環節的各部分能夠彼此配合，而不會因為個別零件或原料的不足，讓生產停擺？我們怎麼處理交換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糾紛，或避免欺騙以及機會主義的剝削？就創新而言，成功的創新會提升生產力，帶來新技術、新產品。但是在另一方面，失敗的創新不只徒勞無功，浪費資源，大規模的創新失敗甚至可能危及經濟的再生產（大躍進就是個代價很高昂的例子）。換句話說，要收割創新成功的果實，一個社會必須能無情而迅速的淘汰失敗的創新。

「傳統」社會的自給自足特性是因為缺乏機制，難以克服分工中的協調問題、訊息問題、機會主義問題，而其保守性格則是因為沒有機制能夠迅速淘汰失

敗的創新，無法承擔創新的浪費與風險成本，所以不能鼓勵創新。用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的理論來說，也就是：當一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很高的時候，低分工水準其實是符合經濟效率的。(楊小凱，2003) 在這樣的社會中，市場及商業被置於宗教、社會、文化或政治傳統與習慣的監視約束之下，以避免自由流動、逐利動機、與冒險創新威脅到精緻而穩定的生產與分配模式。當然，這樣的社會固然「安全有保障」(自給自足或職業世襲就不會產生失業)，但生產力也難以提昇，甚至會實現馬爾薩斯的灰暗預言：緩慢的技術進步趕不上人口成長，缺乏非農業投資管道的社會不可避免的走向土地兼併，而天災人禍則將人均生產力已徘徊在飢餓線邊緣的社會推過動亂臨界點。

西歐市場社會的崛起，其實為歷史上的突變，其背後固然有不少長期趨勢力量，但是也有種種偶然因素推波助瀾。雖然在過程中國家介入的痕跡明顯可見，但要說此過程符合演化理論似乎也無不可：突變的社會模式取得始料未及的優勢，進而迫使原先佔絕大部分的「正常傳統社會模式」隨之適應改變，而市場現代性則取代傳統性成為社會理性。

市場社會的突變為何成功？首要原因當然在於形成市場競爭機制。市場競爭加上利潤虧損的獎懲機制，驅使被逐利動機所引導的生產者積極尋求、滿足消費者與其他生產者的需求。競爭糾正不適當的資源配置，並且大幅提高在分工交易中欺騙他人與實施機會主義的代價(吃虧上當者可轉向他人)，從而降低交易成本。競爭不斷侵蝕既有利潤，迫使廠商進行創新。創新成功的豐厚利潤報酬提供技術變革的誘因，但是失敗的創新也會被市場競爭無情掃除。這也就是經濟學者熊彼得(Schumpeter, 1934)所說的「創造性破壞」，或市場社會的成長機制。

許多論者關心現代社會「高系統性風險」的問題。「系統性風險」與其說是市場現代性的產物，不如說是高度分工社會必然面對的問題。隨著分工與生產技術日益複雜，現代社會中的整體知識存量遠比傳統社會要多。但是雖然在現代社會中，個人擁有知識的絕對量比傳統社會中的人豐富，他所不知道的當代知識也會遠比傳統社會中個人所不知道的當時社會已知知識要多得多。這也就是海耶克

(Hayek) 所強調的，只有當我們不必知道太多資訊，就能夠不假思索做許多重要事情的時候（例如不用知道汽車的機械原理就能開車、不用學會電子通訊理論就能使用手機），文明才能進步。（吳四明，2002：78-80）

分工經濟越發達，每個人生活中「不知而行」的成分也越高。在現代市場社會中，我們的生活依賴許多分工環節，每個環節都牽涉複雜的知識，而且可能只有少數的專家能夠掌握。在這其中，當然有專家犯錯或濫權的風險。傳統習慣顯然難以應付專業知識的快速累積與變化，而如果要依靠政治來全面性的監督專家，既需要很高的官僚行政成本，也可能陷入「又要由誰來監督政治專業」的難題。如果想要依靠公民全面參與來間接或直接監督指導專家，則每個人都需要投入極高的學習與參與成本，等於又與分工及專業化經濟背道而馳。市場社會的解決之道無他，還是在於「競爭」兩字。透過價格機制與逐利動機，社會大眾能夠藉助市場競爭讓專家對抗專家，以約束個別專家對於專業知識的可能誤用與濫用，也從而有效降低分工社會的系統性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競爭機制是歷史及社會建構的產物。為了要解決經濟史學者 North (1990) 所說的「公正第三者」問題—如何讓國家具備與私人高度不對稱的武力與強制力，而同時其強制力又能有效為制度所約束，以成為既具備可信的執行能力，又不會藉此尋租的契約裁判者及強制執行者—現代國家、民主制度與市場社會在歷史中同時成為現代性的制度特色，並非偶然。競爭機制的建立讓市場社會能夠利用專業化經濟及創新的好處，造就已知歷史上首見的長期持續成長社會，以及高度的物質便利與繁榮。而許多傳統社會，儘管可能對於逐利動機與商業文化高度疑慮，對於自由流動與傳統崩解的衝擊惴惴不安，仍然難以抗拒大量消費與船堅砲利的壓力，終究被捲入市場社會的建構過程之中。無論如何，對於這些社會而言，市場現代性的建構並非易事。不少社會可能經歷快速而壓縮的市場化與商品化，但許多市場並不具備足夠的現代性—或者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也就是出現「市場失靈」的問題。

「經濟效率」中的現代性意涵

主流經濟學始於亞當·斯密對於市場現代性的精闢分析，當然也繼承〈國富論〉的作者對於價格機能、自由競爭、「看不見的手」的支持，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學認為所有的市場都具備足夠的現代性。

怎樣的市場具有現代性？這裡必須引入經濟學對於「經濟效率」的觀念。不少對現代性的批判，經常把「只重視效率與成本效益分析」視為是經濟現代性的問題所在。無論如何，在這種批判中所謂的「效率與成本效益分析」，如 Fotopoulos (2005) 所說的，是一種狹義的「技術經濟」(techno-economic) 觀念，意指「極小化投入與極大化產出」，而這與經濟學中所說的「整體社會／經濟體系達到經濟效率」並不相同。Fotopoulos 在批判「成長意識型態導向的經濟」時說：「由於這種（技術經濟的）經濟效率意識型態不考慮經濟過程中的『外部性』，特別是成長過程中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結果造成今天全世界對於環境的普遍破壞。」絕大部分的經濟學教科書應該都可以同意上面這一段話—除了 Fotopoulos 所說的「經濟效率」與經濟學中定義的「經濟效率」不同以外。因為不考慮外部性的成長，根本不可能達到經濟學所定義的經濟效率。

根據經濟學的定義，當經濟體系的資源配置達到經濟效率時，意指社會總效益減去社會總成本達到最大。經濟效率並不一定指向「廠商的生產成本越低越好」或「廠商的產出越多越好」。為什麼？就是因為可能有「外部性」存在，使得「個人所考慮的成本」低於「社會所承擔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與「經濟效率」的理想狀態相比，廠商會生產得太多。與此有關的另一個概念是，經濟效率中所考量的成本是「機會成本」而非「會計成本」。也就是說，使用資源的社會成本是一旦資源被如此使用時，社會因而損失的其他用途中的最佳用途，而不只是在廠商會記帳上面出現的成本。舉例而言，今天如果政府「優惠」廠商，將一片原始山林免費交給廠商開發成度假村，那麼可能廠商伐林、整地、建築的會計成本不高，但是整個社會損失了山林的機會成本（水土保持、清靜空氣、物種保護等

等) 卻非常可觀。

可以看出，在這種定義之下，並沒有所謂「工業化、技術先進、GDP 成長就符合經濟效率」的說法。如果一座「先進技術大工廠的高產量與高成長」背後隱藏的是對土地、空氣與水的嚴重污染，而其成本由他人承擔，或者因政府補貼，使得廠商使用資源的機會成本與會計成本之間有巨大落差，那麼這樣的工廠蓋得越大、產量越多、「工業化」推進得越迅速、產值成長得越快，整個社會偏離經濟效率越遠，或者我們可以說，也就越不具現代性，而這樣的市場體系是「失靈的市場」。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種定義之下，**經濟效率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如果我們採取個人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效益與社會成本是個人效益與個人成本加總的成果，那麼因為個人對於效益（可以看成是：為了取得這件事物，個人願意付出多少代價）與機會成本（為了這樣使用資源，在個人預期必須捨棄的事物中，最重要的是什麼）的認知是主觀的，會隨著社會互動與對話而改變，一個社會的經濟效率何在，自然也可能隨著社會互動與對話而改變—或因為社會運動者的努力而改變。舉例而言，如果大眾主觀上認為空氣污染會減損健康或降低生活品質的成本不高，那麼汽機車排放廢氣的外部性也就不強。另一個例子是，經濟效率本身並不偏好使用農藥或採取有機栽培的生產技術，也不判斷何者是「現代的」、「進步的」。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因為社會互動與對話，提高了消費者主觀認定的有機農作物的效益（不管是因為重視身體健康還是因此能得到參與生態保護的滿足感），同時也提高了生產者主觀認定的使用農藥的機會成本（例如重新評估使用農藥會對健康造成的損害），那麼在經濟效率的資源配置之處，就應當有更多的有機農作物被生產出來。

除了外部性之外，一般經濟學教科書都還會列舉出好幾種市場不具備足夠現代性的情形（市場運作結果不能達到經濟效率），例如：無法克服搭便車問題以提供充足公共財（這可能會回過頭來造成高交易成本）、公有資源導致的「公有地的悲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無法對資源建構清楚的產權，還不如回到傳統

習慣的使用約束，否則競爭會產生竭澤而漁的惡果)、獨佔(此時逐利動機不再被市場競爭有效約束，也往往是很多「專家獨裁的高系統性風險」的由來)。(註三)無論如何，一些批判經濟學的論者經常指出：經濟學中的經濟效率並不關心所得分配(或社會平等)的問題。這個說法有其正確性，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誤導，值得我們在這裡加以探討。

經濟學定義的經濟效率的確與所得分配無關。這個意思是說，不管是所得分配極端不均的情況，或者是所得分配比較符合某種社會正義標準(例如符合平均主義或 Rawls 的正義理論)的情形，都可能符合經濟效率的定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一個社會不能從許多可以符合經濟效率的所得分配情形中，選擇比較偏好的所得分配狀況。這也就是經濟學「第二福利定理」的意涵：在相當程度上，我們可以進行所得重分配，但維持價格機能，以透過市場機制達成社會選擇的正義理論所偏好的分配狀況，從而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平等。(註四)

舉例而言，一個社會可以在價值觀上偏向 Rawls 的正義理論，因此希望提升低所得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與機會，而這可以透過好幾種方式來達成：政府或企業提供獎助學金、政府對低所得家庭的學費支出進行補貼、或者乾脆保留國立大學四分之一的名額給平均所得在最後 20% 的家庭子女。但是從第二福利定理的角度來看，下下之策莫過於管制學費，因為這會嚴重扭曲價格對資源進行效率配置的功能。不幸的是，這樣的情形已經在台灣發生。資源雄厚、受政府高額經費補貼的公立大學維持低學費，吸引了因社經優勢而入學競爭力強的中高所得家庭子女就讀。反觀私立大學的學費雖然比公立大學高出將近一倍，但是並不足以翻轉公立大學所受的補貼優勢，因此所招收的反而是平均所得較低家庭的子女。高等教育的平均每生經費逐年下滑，而中高所得家庭挹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雖高，卻無法有效流向高等教育的品質改善，而是將很大一部份花費在競爭公立大學的入學機會。在一個憲法明文保障交易自由的國度裡，「高學費的高等教育」卻如同毒品與槍枝一樣，難以透過公開市場交易取得。簡而言之，管制學費不但扭曲了價格機能，也扭曲了反高學費者的社會公義理想。(註五)

從上面針對經濟效率與第二福利定理的簡短討論中，應該可以發現，在經濟學的規範性理論中所蘊含的理想現代性，並不是一種只在乎極大化生產、極小化投入、或技術成長取向的簡單現代性，而是能夠考慮外部性問題與承認社會平等價值，比較近於 Beck 與 Giddens 所說的「具反省性的現代性」。(註六)當然，很重要的一點是，雖然經濟學理論重視競爭市場在追求經濟效率上所能發揮的功能，但其中並未隱含著：「我們什麼都不必做，一切交給市場就好了。」因為，如前所述，第一，市場社會能形成具有相當程度公平性、非暴力性、保障自願交易的競爭機制，是社會建構的結果；第二，什麼樣的社會資源配置符合經濟效率，是社會建構的結果；第三，如何從多種可以符合經濟效率的財貨分配可能中選出社會正義理論偏好的分配狀況，並透過社會共識所支持的所得重分配機制與市場機制予以達成，是社會建構的結果。

偏離經濟效率的「經濟現代化」

雖然經濟學並未支持一些簡單的、欠缺反省性的現代性觀念，但是在現實中，「工業技術、壓低成本、大量生產、高度成長」仍然經常被視為「經濟現代性」的代表，而「市場競爭的現代性」則往往被認為與「生態、平等、安全」的價值有所衝突。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認知落差？

產生這個落差的根源，應該不在經濟學教科書裡或在經濟學的課堂之上，而在於不管經濟學怎麼說，整個社會對於「什麼是現代化經濟」已經有了根深蒂固的看法。舉例而言，當我們看到竹科、晶圓、101 成為台灣經濟現代化的象徵，媒體輿論對於「我們的經濟成長率與平均每人 GDP 在亞洲四小龍中排名第幾」憂心忡忡，「外匯存底」做為國家力量的展現，而「拼經濟」成為經濟治理的指導哲學時，我們不難理解關於「經濟現代性」的刻板印象從何而來，而這其實也顯露出我們從歷史所承繼到的現代性中，屬於「被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殖民現代性」與「黨國現代性」的特質。

西方發達市場社會中的經濟現代性，包括對應配套的法律規章、治理方式、

文化觀念、公民社會，並非一蹴而及。現代性在西方的歷史意涵，是從封建社會開始，接近四、五百年的轉型過程。在不同的階段，市場社會的發展都面對不同的挑戰，也都必須花幾十到上百年的時間來克服這些挑戰。但是在台灣，「現代化」的主要過程不過是百年左右，而經濟、社會、政治的劇烈轉型更是集中壓縮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之間。

南韓學者 Chang Kyung-Sup (1999) 指出，在這種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充滿許多會造成高社會成本與高總體風險的元素。以南韓為例，這些元素包括：在壓縮的民主化過程中如影隨形的家長式政治權威主義與貴族式民主、黨國主導下壓縮的資本積累過程造成壟斷與行為專橫的財閥、壓縮的工業化過程中對於勞工的濫權與社會排斥、環境與生態破壞對於健康與生活品質的威脅、忽視基本福利權利與社會安全網的建立、缺乏歷史連續感與主體性並且習慣自我否定的意識型態與文化。但是，雖然這些政治、經濟、社會、生態、文化上的問題可能影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前所未見的經濟成長速度與社會轉型幅度卻產生一種催眠性的效果，使得大家樂觀的認為這些嚴重的成本與風險都可以在壓縮的成長與轉型過程中迅速得到緩解，甚至消弭。然而，一旦經濟成長的速度放慢，這些幾十年間積累的巨大成本與風險集中爆發出來，而期待問題會在「不久的將來」自動解決的樂觀氣氛悄然消失，這些新興的「現代社會」就可能進入一個對於自己身處其中的現代性困惑不安與不確定的時代。

Chang Kyung-Sup 對於南韓「壓縮的現代性」的批判，與澄社在有名的〈黨國資本主義〉中對於「黨國現代性」的批判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嚴重的是，台灣經濟體制在層層遮掩之下，卻包藏了一個「集權主義」一黨專政的禍心，所有政府藉管制法規所壟斷的市場特權、或是藉著經濟理由所創設的事業單位，都難逃被執政黨工具化的命運，以致政府高度掌控經濟發展方向與大量介入經濟活動的「好處」。(澄社，1991：24)

顧忠華教授 (2006) 將台灣的歷史分成五種「現代性類型」：西班牙與荷蘭時期的「淺層殖民現代性」、明鄭至清帝國時期的「土著化現代性」、日治時期的

「深層殖民現代性」、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黨國現代性」、政黨輪替後的「本土現代性」。由高速經濟成長所標誌的「壓縮的現代性」，大致也就對應到「黨國現代性」到「本土現代性」的歷史階段。所謂「黨國現代性」的階段，意指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後施行高壓統治，以一黨專政的方式，鎮壓所有對政權維繫可能產生威脅的社會力量，而除了政治高壓、經濟壟斷等統治手段外，還透過教育、文化、媒體等由國家機器所掌握的社會化機器，大量傳播鞏固其政權的意識型態。在黨國主導下所進行的「經濟現代化」，其實有許多特質是與「市場現代性」不相容的。最明顯的當然是「特權壟斷」與「公平競爭」背道而馳。除此之外，藉由隱藏與扭曲重要的資訊（如外部成本的存在與嚴重程度），操弄媒體與教育對於事物成本與效益有多高、多低的單面向詮釋與傳播，以及全面監控與介入社會過程，黨國體制既妨礙市場競爭達成經濟效率，也獨佔與扭曲了對於「什麼是經濟效率」的詮釋，並且壟斷了「要達成哪一種社會分配狀況」的選擇。

台灣的經濟現代化過程不只是壓縮的，還受到黨國體制的操控扭曲，也因此不少方面出現與經濟效率嚴重偏離的現象。政黨輪替之後，雖然在矯正一些偏離經濟效率的外部性問題上有相當進展，但是也有不少地方出現膠著的情形。不時可以看到政府決策在各種意見與力量的拉扯中猶疑不前，甚至原地踏步，有時甚至導致一些人開始懷念黨國威權的「美好時光」。

但是對於「黨國威權統治的往日美好時光」的鄉愁其實是一種對於確定感的嚮往，而這種確定性卻是建立在「自己不必做決定」之上，其制度性的本質則是「由威權壟斷的單面向思考與決策代替多元社會的民主自由建構過程」。說到底，「黨國現代性」近於外來「殖民現代性」的延伸。持平而論，在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中，殖民性格的威權統治相當成功的強迫社會打破習慣約束，脫離傳統制度規範的均衡狀態，並透過政治指令的強大動員力量加速基礎建設與工業化。但是在這種「殖民現代性」的負面影響當中，除了威權國家所追求與塑造的「現代化經濟」帶有很強的壟斷性、高外部成本與高總體風險之外，還有很嚴重的一項副作用是：被殖民的人們習於被決定與告知「經濟發展」的價值與目標為何—從

帝國內的農工分工、南進基地、毋忘在莒、三民主義模範省、一直到已然喪失實質價值意涵的「高外匯存底與高經濟成長」。結果是，一方面，社會運動看到了太多威權壟斷體制所造成的市場失靈現象，也連帶對於市場失去信心，甚至抱持著敵意。另一方面，政黨輪替之後，殖民與威權統治的陰影漸漸遠離，政府或者出於自省，或者因為對於社會勃然爆發的多元利益、力量、聲音與價值觀的衝突感到不知所措，而不再對於價值與目標做強力指導，甚至希望公民社會提供解答。但是公民社會卻經常難以提出具有主體性、在價值觀上有一致性、在技術上有可行性、而且立基於理性成本效益分析之上的解答。

同社會其他層面一樣，在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台灣經濟，也需要經歷從「殖民現代性」、「黨國現代性」、到「主體現代性」的轉型。我相信，當台灣的經濟體制充分具備自由開放與公平競爭的性格，而且社會大眾能夠在資訊充足與不被扭曲的環境中，透過理性與彼此尊重的互動溝通，對於重要公共政策所涉及的效益與機會成本做出具有主體性、深思熟慮的判斷與評價，並且——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能夠根據自己所認定的經濟效率與自己價值觀所支持的社會分配情形做出具有前後一致性的選擇，並願意付出代價時（註七），我們的社會才比較能夠凝聚共識、國家與公民社會才不至於屢屢陷入「父子騎驢，倒為驢騎」的窘境、公共政策才能比較具備合理與一致的治理現代性，而我們也比較能夠看到具有台灣主體性的市場現代性理想風貌。

結語：市場與社會改革

建立於自願交易之上的競爭市場是否站在社會進步的對立面？我們或許可以從三個面向來看這個問題。第一個面向是價值觀層次的。自由交易是個人在追求自我實現時的重要憑藉，也是不應否定的權利。舉例而言，儘管自由買賣勞動力的市場經常受到批評，但是在歷史上，它對於封建制度與父權秩序下難以翻身的被壓迫者的確提供了巨大的解放力量。即使到了現在，我們還可以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看到統治階級想要藉著否定就業自由，來維持階級與性別上的優勢地

位。自由交易也是其他自由的重要基礎。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自由交易與私有財產，我們要如何讓公民擁有健康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註八)

另一個面向是可行性的考量。今天，除了競爭市場以外，我們並沒有看到另外一種能夠產生高度繁榮與持續成長的替代社會制度—或者至少沒有看過成功的歷史前例或當代實驗。這並不是說競爭市場沒有成本—競爭帶來高度壓力、分工使得人們的工作失去整體性、專業化造成許多人的生活與自然隔絕、個人自由仍須受到市場供需力量的約束—但是至少就目前絕大部分人的共識而言，以傳統社會或計畫經濟取代市場社會的機會成本—不管是生活上的不便利、營養、衛生及教育的缺乏、對於個人自由與創意的剝奪、或者是沒有能力運作協調一個高度分工的社會—絕對太高而難以接受。(註九)

第三個面向是工具性的。善用市場機制，其實有助於達成許多社會改革的目標。舉例而言，要促成多元、平等、尊重的社會，市場競爭—讓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歧視都必須付出代價—是消弭歧視的有效工具；比起道德勸說或不斷進行環評與開發的拔河，直接開徵碳稅更能「說服」廠商與消費者採用比較節能的技術與產品；阻擋怪手與裸體抗議水庫開發極具戲劇性，相較之下，提高水價比較沒有戲劇性，但是可能也比較能有效促使廠商與消費者以實際節水的作為來「支持」少興建水庫的政策；以呼籲、監督、請願、立法的方式來試圖達成教育改革的目標很好，但是何不試試讓不同學區間的學校可以競爭、吸引彼此的學生，讓持有教育券的家長能夠透過選擇，獎勵成功的教育者，然後讓獲得家長肯定的學校整併或淘汰家長所不認同的學校？

這一篇文章試圖闡述：市場能做什麼、會做什麼，是由社會建構的。殖民政府、黨國威權、或是有厚實公民社會基礎的現代國家會塑造出不同的市場型態與市場運作結果。台灣由「殖民現代性」、「黨國現代性」往「主體現代性」的轉型改革議程之中，應該也要包括市場現代性的重塑在內。當然，這個過程中要克服不少重大挑戰。舉例而言，要對公共政策的「效益」與「機會成本」做主體性的思考與選擇，個體不只需要充足資訊，需要評估資訊的能力及意願，更需要認識

有所謂「我的價值觀是什麼」(而不是「大家都這麼認為」或「別人都這麼說」)這一回事,並且把選擇價值與維護價值視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只想藉著「站在大多數人支持的那一邊」來輕鬆搭便車。但是,這種對價值觀的主體性思考與行動倫理,恰好是殖民教育與黨國教育中最缺乏的,而政黨惡鬥造成的公共冷漠,更加深了從「殖民現代性」過渡到「主體現代性」的困難。

除此以外,個體需要與他人對話、互動,以從中探索及建構偏好、需求,並藉此認識及評估機會成本。媒體做為公共對話的指引與中介,在需求與機會成本的建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我們的媒體隨著對於不同政黨或政治人物的偏好,會對於同一個公共政策的成本效益與好壞做出前後矛盾的極端判斷,違反「一致性」的基本現代理性標準,而這與同一份媒體在飲食與影劇版的表現往往大不相同。(可能受此影響,目前我們一般公民做為「飲食與韓劇消費者」的成熟程度也似乎遠高於「公共政策消費者」的成熟程度。)

無論如何,不管從交易自由的價值、從務實面、或從工具面來看,我認為市場現代性應該被放入台灣目前社會改革的重要議程中,而許多社會運動也應當嚴肅考量,可以如何藉由市場機制達成社會改革的目標。做為一個市場現代性的支持者,我想再度強調的是:否定市場能夠扮演的積極角色,不只可能使改革議程失去重要實現方法,陷入「又要罵政府無能又要依賴政府萬能」的窘境,而且還可能造成嚴重反挫,甚至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否定市場競爭,最可能的結果不是壯大公民社會,而是強化壟斷性、競租性的政經結構。而在另一方面,做為公民社會的信仰者,我也想在最後指出:追求市場現代性,並不意味著弱化民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角色,而是相反的,會因為現代經濟治理的需要,更為強化這兩者的重要性—這是受到理論與歷史經驗支持的客觀規律,不用擔心會因為「經濟自由主義者」的主觀願望而轉移。

(註一): 參見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dernity>。

(註二): 許多人把工業化視為現代性的重要特質,但是正如 Fotopoulos (2005)

所指出的，工業化其實是市場社會的產物。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沒有市場社會興起，支持高度專業分工並提供積極創新的誘因，產業革命是無法發生的。

(註三)：關於這些概念的詳細介紹，可以參見 Mankiw 的〈經濟學原理〉(林修葳、謝振環、饒秀華譯)。

(註四)：對於第二福利定理的內容及意涵有興趣進一步瞭解的讀者可以參見 Varian 於〈現代個體經濟學〉中的介紹(劉楚俊、洪啟嘉譯)。

(註五)：參見台大駱明慶教授的有名研究：「誰是台大學生？」。另外也可以參考駱教授在其部落格「意識型態咖啡」(<http://blog.yam.com/lakatos>)中針對大學學費問題所做的一系列討論。

(註六)：我們在這裡主要是澄清對於經濟學規範性理論的常見誤解，但並不意味著這些規範性理論是不能批判的。舉例而言，經濟學的規範性理論源於功利主義傳統，其評價標準基本上以結果論為主，結果可能就忽視了過程中—例如能夠「自由」交易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價值。另一個例子是，Pareto 效率配置的觀念拒絕在人際之間進行效用水準的比較，這對於許多現實公共政策可能缺乏引導作用。可以參見 Amartya Sen 在 *Development as Freedom* (1999) 中的討論。

(註七)：舉例而言，如果我們認定二氧化碳具有極高的外部成本，就應當支持政府提高燃料稅、課徵碳稅、補貼高生產成本的潔淨能源，並且願意接受產業轉型過程中可能帶來的失業增加與經濟成長減緩的代價；同理，如果我們認定水庫會帶來我們難以承受的外部生態成本，就應當樂於接受高水價及其對我們日常生活與產業所帶來的衝擊。

(註八)：基本上，這是 Amartya Sen (1999) 為市場交易自由所做的辯護。

(註九)：雖然單面向強調「平均每人 GDP」或「經濟成長率」可能會誤導我們過度簡化對於「經濟現代性」以及「社會發展目標」的思考，但是，這兩項仍然是可以間接衡量經濟現代性或社會發展程度的有用指標。其原因在於，第一，不管在理論與實證上，「平均每人 GDP」以及「經濟成長率」的高低與「經濟現代性」的程度以及各種社會發展指標(例如平均壽命、受教育程度、公共衛生等等)

有很強的關連。第二，雖然「高平均每人 GDP」及「高經濟成長率」本身不是「經濟現代性」或「社會發展」，但是它們可以是「經濟現代性」能力的彰顯，也代表一個社會有能力追求更好的發展。當然，我們在使用這兩項指標的時候應當注意，是不是可以從更寬廣的面向（或更多元的指標）來探討一個社會的現代性與發展程度。我們也應當注意在 GDP 的觀念中不包括什麼—例如休閒的價值、環境外部成本、志願服務、公共參與、所得分配—而這些可能對於我們判斷與追求一個「好的社會」是相當重要的。最後，單單有能力並不代表真正能實現「好的生活」。當一個社會擁有相當水準的平均每人 GDP 時，要用這樣的能力去實現怎樣的生活，這仍然必須視社會建構與個人選擇而定。

參考文獻

- Chang Kyung-Sup (1999).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South Korea Society in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28:1, pp. 30-55.
- Fotopoulos, Takis (2005). The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and Inclusive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Special Issue. (<http://www.inclusivedemocracy.org/journal/>).
- North, Douglass.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en, Amarty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吳四明（譯）（2002）。T. Buchholz 著。〈經濟學的第一堂課〉。台北：先覺。
- 林修葳、謝振環、饒秀華（譯）（2003）。N. Mankiw 著。〈經濟學原理〉，第三版。台北：東華書局。
- 楊小凱（2003）。〈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澄社 (1991)。〈解構黨國資本主義：澄社報告 0 0 一〉。台北：澄社。

劉楚俊、洪啟嘉 (譯) (2000)。H. Varian 著。〈現代個體經濟學〉，第四版。

台北：茂昌圖書。

駱明慶 (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

30:1，頁 113-147。

顧忠華 (2006)。台灣的現代性—誰的現代性？哪種現代性？〈當代雜誌〉，221，

頁 66-89。